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新旧
唐書
与
新旧
五代史
研究

XINJIU TANGSHU YU
XINJIU WUDAI SHI YANJIU

第七卷

分卷主编 ◎ 向燕南 李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七卷

新旧唐書 与 新旧五代史
研究

XINJIU TANGSHU YU XINJIU WUDAISHI YANJIU

分卷主编 向燕南 李 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向燕南,李峰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瞿林东主编)

ISBN 978-7-5000-8009-1

I. 新... II. ①向... ②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唐代②中国-古代史-研究-五代(907~960) IV. K242.042
K243.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7360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前期统筹 劳雅路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037

电话 010-88390671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数 410千字

印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00-8009-1

定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凡 例

一、本书收录范围,限于 1901 年至 2000 年中国学者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的文章、讲话等,未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及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一般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二、本书收录原则重在学术标准。

三、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均收录全文,其标目、文字,一仍其旧,一般不作删节或节录,以存其真。

四、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其注释形式作如下处理:凡脚注(页下注)、夹注(随文注)者,一仍其旧;凡文尾注者,为读者阅读方便和全书体例大致统一起见,则移为脚注(页下注),移置中不改动其注文。

五、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一律于文末圆括号内注明其原始出处。

六、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如系繁体字竖排者,一律改为简体字横排,并按规范加上新式标点。

七、本书各卷均包含总序、前言、目录、正文、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等几个部分:总序略述全书宗旨;前言概括本卷主要内容及问题,并对重要专著和未曾发表于报刊的重要论文作适当评介;正文与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略按总论、分论分类编次,以便于阅读和检索。

总 序

瞿林东

—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朝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②。

①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②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把编年体皇朝史(朝代史)也列为“正史”,但后世少有遵循者。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清人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从上引《隋书·经籍志》来看,“正史”之说当先于隋朝。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有南朝人阮孝绪所撰《正史削繁》94卷,似是根据有关正史删削而成。这是目前所知“正史”之最早的称谓。《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之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①四库馆臣把“正史”看作历代历史著作的“大纲”,认为其余14类或是“参考纪传”,或是“参考诸志”,或是“参考论赞”,尽管这一见解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表明“正史”在诸种史书中的崇高地位。

二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对历史学的变革和走向近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梁启超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还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这一看法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自己已经改变了对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的看法,他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讲到“人的专史”时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它，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这个说法同《新史学》对二十四史的说法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引用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这番话，是为了说明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能修正自己的某些不恰当见解的史学家。同时，我们引用梁启超的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时至今日，也还有一些对二十四史抱有偏见的人，其中或许有人就是受到梁启超早年看法的影响。

当然，二十四史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时代的局限和作史者立场、观点的局限，还有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局限，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二十四史决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相斫书”，而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伟大记录。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三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二十四史,如何评价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卓越贡献,是人类文化工程中的一个罕与其匹的奇迹。

二十四史的撰写,上起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历代纂修,未曾中断,各朝正史,代有所出,下迄清代官修《明史》,前后连续一千八百多年,历代史家、史官笔耕不辍,成此系列的浩大工程,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上下近五千年中国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中华文明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伟大轨迹,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作为纪传体史书,是以记述历史人物活动为主,同时记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及有关典章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综合体史书。这种综合体史书,是古代史学家用以全面反映历史进程、历史面貌的最好形式。清代四库馆臣把“正史”称为“大纲”,把其他十四类史书看作是参考“正史”中的纪传、诸志、论赞而作,固然不恰当,但从中可以看出“正史”之全面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和价值。

二十四史记载了大量的、社会各阶层或不同群体的历史人物,显示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恩格斯针对欧洲的历史这样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

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二十四史虽然也时时讲到“天命”,但它客观上都是记述人的活动,它所展现的,正是无数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道德、智慧等留给后人的启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这就是一种启示。江泽民指出: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森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这是更高境界的、更加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要之,二十四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方面的历史影响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它是我们为之自豪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信》(1999年4月25日),《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的中华文明的光辉记录。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35 年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①。史书重在“事实”,正史既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 1981 年曾对二十四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②这可以看作是对二十四史的全面的评价。

四

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精心的整理,也可以说是研究中有整理、整理中也有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其所得者专著以百数,论文则以千计。

以研究而言,至少包含考证和评论两种类型。前者如范文澜的《正史考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等,都是名著;后者如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季镇准的《司马迁》、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安作璋的《班固与〈汉书〉》等,亦皆佳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精彩之作,更是不胜枚举。考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镜源流,正其讹误,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研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绪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开明书店 1936 年版。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言》中这样写道：“《四库》区分群史，首曰正史，即糅合私修官修之二十四史而成者，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凡一十五类，而正史为之大本。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过此以往，则非日力所及，不复赘述。考四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时增《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有四。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文澜偏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善，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大雅君子，傥不我遐弃，幸复有以教正之。”^①这里说的“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就是作者“考略”的旨趣，即“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此系“考略”者之良苦用心。

白寿彝在评论《史记》一书是“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时写道：“《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妹，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

①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①这一段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作者多年研究《史记》的心得都表达出来了,人们从作者的这些认识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史记》的伟大。

至于整理,主要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精心点校。前者如顾颉刚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后者如张元济等在二三十年代之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集众多学者点校二十四史,都是浩大的工程而有大益于学林。

《二十五史补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史学家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这一工程,是因为:“历代史书里头,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历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的工作。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补作的工作,像钱子文作《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讹》、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像梁玉绳作《〈汉书·古

① 白寿彝:《〈史记〉新论》,第74—75页,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憾惜”，编者搜求丛书和稿本，荟萃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定名为《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七十多年来，此书对历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序文中说：“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若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讵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②以十余年的工夫，“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就是为了“备读史者之参证”，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什么动力？这除了说明二十四史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说明校史者对二十四史极其敬重和热爱，恐怕没有别的原因了。作为读者，要真正体会到校史者的这种甘苦和心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史学遗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载《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书首，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②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产整理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可以说,当今的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及众多的史学爱好者,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对自己的重要。甚至可以认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在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一步一步走向史学殿堂的。正如参与点校工作的史学家唐长孺、陈仲安所说:“二十四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照原样重印行不行呢?我们认为,那样做很不便于读者。古书既无标点,又无断句。由于句读不明而引起的误解屡见不鲜。特别是到了近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变化很大,现在的青年阅读二十四史,实在是困难重重。即使中年以上有过阅读古汉语训练的人,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读懂。各史流传的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漏,给阅读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花一番工夫整理二十四史是必要的。标点便是这种工夫之一。我们按文义划分段落,区分句读,让读者易于理解。在人名、地名、书名旁加上标线,使读者易于识别。把一连串的官称、爵号、器物名称用顿号隔开,以利读者区分。把书中引用的古书、成语、文章、讲话加上引号,使读者明了。这样就使读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时间。”^①这些话,讲得很具体,也很中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对此当有深切的体会。二十四史点校本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推进历史知识的传播,推动历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其功可谓大矣。

^① 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本为读者提供方便》,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的感想和体会》,《光明日报》1978 年 6 月 1 日。

五

20 世纪的几代学人,用他们的勤奋、心血、智慧和对于二十四史的尊崇与挚爱,为后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在二十四史的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为了总结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推动关于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二十四史的广泛传播,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从数千篇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和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汇集成书,定名为《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予以出版,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和研究。本书凡十卷:第一卷《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第二、三卷《〈史记〉研究》(上下),第四卷《〈汉书〉研究》,第五卷《〈后汉书〉、〈三国志〉研究》,第六卷《〈晋书〉、“八书”、“二史”研究》,第七卷《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第八卷《〈宋史〉研究》,第九卷《辽、金、元史研究》,第十卷《〈明史〉研究》。

本书各卷主编在搜求有关论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时间的限制和文献资料的分散,难以求全,因而遗漏在所难免,应该收录而未能收录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对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并给与谅解和帮助,以裨将来再版时有所改进。

2007 年 9 月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1949 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后到 20 世纪末 3 个时期。1949 年以前属于学术研究的开创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论著比较少,据不完全统计,论文有三十余篇,专著仅有数种。此期对新、旧“唐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文本的考订、疏证与补充方面。如丁谦的《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等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传、沙陀传、北狄列传、东夷列传,以及新旧《唐书》西域传等进行了系列的考证。罗香林的《唐书神秀传疏证》一文对《唐书·神秀传》予以疏证,陈晋的《新唐书刘宴传笺注》一文对《新唐书·刘宴传》进行了笺注,白寿彝的《新唐书·大食传注》一文对《新唐书·大食传》作了注,岑仲勉的《新唐书突厥传拟注》一文对《新唐书·突厥传》作了注。钱宝琮的《新唐书刘宴传笺注》一文对《新唐书》的历志作了校勘记,洩唐的《补唐书陆善经传》一文对《唐书·陆善经传》进行了补充,罗振玉的《补唐书张义潮传》一文对《唐书·张义潮传》作了补充,岑仲勉的《“唐方镇年表”正补》一文对《唐方镇年表》作了正补。岑仲勉的《旧唐书逸文辨》一文还对《旧唐书》的逸文进行了辨析。此外周一良等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一书对《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作了索引,汪吟龙的《驳旧唐书王勃传记文中子事》一文对《旧唐书·王勃传》中所记文中子一事进行了辨析。罗香林的《唐书源流考》一文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唐书》的源流进行了考辨。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则侧重对文本的考订,如班书阁的《五代史记注引书考》一文对《新五代史》注文所引书籍进行了探讨。刘溟波的《“五代史记注”作述考》一文对《新五代史注》进行了探讨。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194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此外,陈登元的《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一文,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旧五代史》长期不受重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张元济的《影印宋庆元本五代史记跋》一文,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宋本《新五代史》进行了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其中台湾和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合起来也不过十多篇论文及数部著作。内容主要是对文本的校勘、订补及笺证。且主要集中在对新、旧《唐书》的研究上。如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证》一书对《唐书》的兵志进行了笺证。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以《新唐书·吐蕃传》为纲目,根据藏、汉文有关史料,对其所记的西藏吐蕃王朝的史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加以增补或考证,对史实的出处加以笺注,对其讹误加以修正。《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一书以《新唐书·南诏传》为纲,汇录有关南诏资料,进行辨伪勘误等考订工作,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推测性意见,对了解和研究吐蕃史、南诏史有一定的帮助。此外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一文对《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进行了探研。柴德赓则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对《新五代史》作了全面的探讨。柴德赓的《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